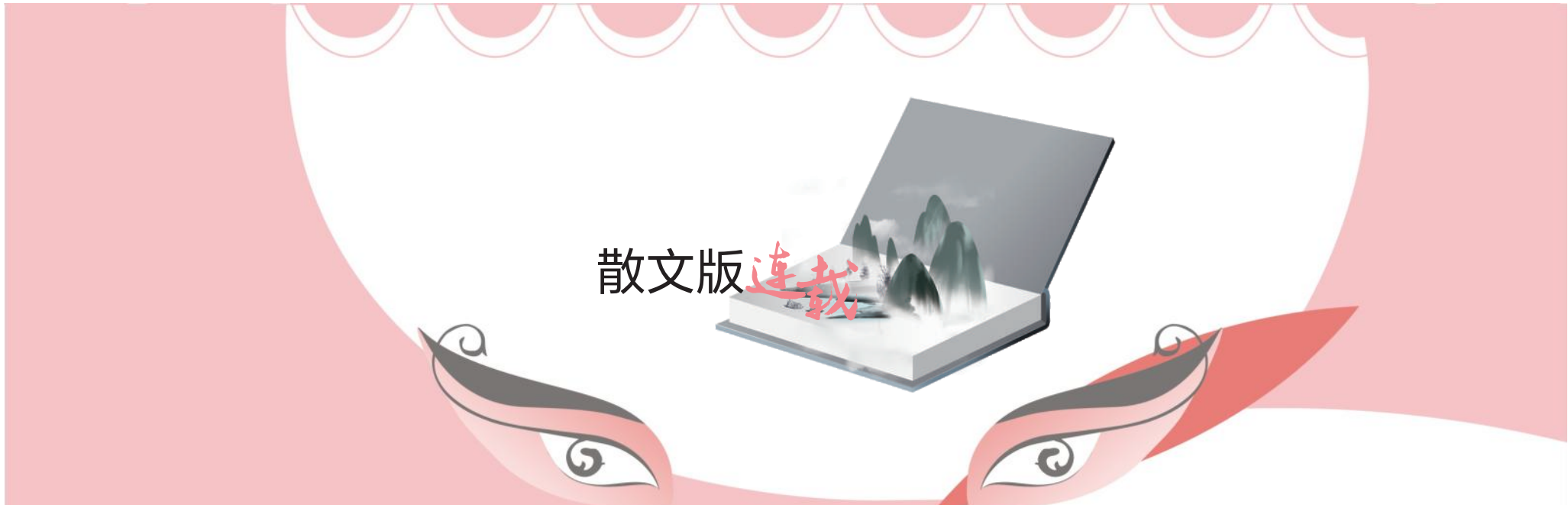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我的语文老师是个很善良的农村姑娘，住在半山腰，学校在山顶。条件所限，她必须住在山上。她每个星期天中午开始爬山，从自家的菜园摘了新鲜的蔬菜和瓜果，像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一样，拄着松枝往山上爬。我曾恨她——在我默写生字时，四十个字写错三个，她就给了我狠狠的三板子，把手心打得又红又肿。我看见她打别的孩子的手心就没有那样使力，他们错的比我多得多。但我也不能否认，她是个好心的老师。她给我垫交学费，后来直接给我交学费。因为这样，我的一部分同学嫉妒我，他们看见我就跟见了刺一样难受。他们说话文老师是我的亲妈。我不反驳，我都巴不得她是我亲妈。

我的同学依色住在山上，星期六放学以后要早早跑回家放羊，一点也不能耽搁，这是父母分给她的“任务”。我和依色是同桌，但我不喜欢她。她有时候偷东西，是一只连窝边草也吃的不讲情面的兔子。我和她同桌，她却连我的橡皮擦都“劫”走，在橡皮擦上写了一个“色”字做标志，就说那是她的橡皮擦了，一直都是她的了。从那以后我就决心再也不能忍这个坏蛋，我要跟她划清界限，故意在桌子中间画一条线，谁若越线，我们就要打一架。她是整个学校里我唯一可以打得过的人。她时常超线，我们就时常打架。但是那一天她很上火，力气很大，把我打败了。胜者为王，败者吃亏，从此那条线便作废了。我们又变成了好朋友。

## 稻草人

◎阿微木依萝

我们的记忆是一面镜子，镜子里照着每一个时段的故事。我现在要写的，是我少年时代的往事。那时我十三岁，坐在五年级的教室里，仗着个子矮，坐在前排。如果我不说，没人可以从外表上看出我的年龄。

间烧火，所以这顿饭，我们只能选在晚上吃。几乎整个白天都饿着肚子。经常读着一篇文章，就会想到各种吃的，尤其害怕闻到学校背后人家飘来的炊烟。

我的语文老师来水沟边看过我们，她几乎要哭了。她帮我们烧火，教我们稀饭要怎么煮才不会烧焦，怎么把柴藏起来才不被雨水打湿。她建议学校给我们一间房子做饭，但是学校不同意。学校怎么能同意呢？如果学生们自己可以做饭吃，要炊事员做什么？集体生活必须要有集体意识，学校能够容忍我们在水沟边煮饭，已经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她的建议反而招来一顿批评，说她作为老师，不劝说自己的学生以及家长想办法弄粮食到食堂吃饭，还帮倒忙。

四年级下学期的某一天，我出了麻疹，躺在床上天旋地转，吃不下饭，也没有力气做饭。接下来的两天，我都没有吃饭。我的弟弟自己做饭吃。他端着那碗半生不熟、锅底发黄的稀饭问我要不要吃，我说不吃。我抬眼看他，发现他的脸上全是锅灰，手上也是，嘴角没有擦干净的稀饭印子像胡须一样粘在那里。那会儿我觉得他已经老了。完了，我想，他都还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就老了。他的衣服小得只够盖住半个肚脐眼，裤脚高高的，完全地露出那双破皮鞋。富贵可以藏，唯独贫穷是怎么也掩盖不住的。

我想起还没有上学的时候，我们在公社食堂的后面对着烟囱闻气味。我们猜他们炒的是鸡肉还是猪肉，为了这个问题，我们在公社背后争论不休，差点儿打起来。最后某要起锅了，我才急忙喊停。我说走吧，人家要吃饭了。他不肯，说要再闻一闻炒菜的烟子。这个印象简直像噩梦一样挥之不去。想到这些我想哭，我可怜我的弟弟，也可怜自己，但最后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流出来。我九岁就不爱哭了。我说不好为什么不哭。我习惯于把眼泪咽回肚里。不管遇到多么悲伤或糟糕的事，我都不哭。

“你吃饱了吗？”我问弟弟。

“吃饱了。”他说。

然后背着书包去了一年级教室。他原本可以不住校，但是父母不放心他单独走三个小时的山路上学。

弟弟走后，我揭开锅盖，里面的稀饭一半是生的，一半烧焦了粘在锅底。他吃的是锅底烧焦的稀饭，他想把没有烧焦的留给我呢。

生病时，我的语文老师来看我了。她摸着我的额头，就像母亲的手，温暖而慈祥。她理了理我的头发。我已经两天没有梳头了。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病好了。我咧开嘴对她笑，干裂的嘴唇出血了，我都尝到了自己的血腥味儿。她扶着我去卫生院拿药，再扶着我回来。那天下午，她给我弟弟拿了一碗米饭。弟弟把那碗米饭赞美了半个时辰，用他仅会的几个词语反复念：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，然后才一点一点将它们吃进肚子里。那都成了一碗冷饭了，他才去吃。他没有热一下米饭，我们的锅就搁在枕头边，发出一股烧焦的味道。

下雪天我们找了一个烧炭的窑洞，窑洞的洞口有三尺来高，低矮，潮湿，但是可以挡住一些雨水。山上有时候一边下雨一边下雪，就像夏天有时候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。冬天为了节省空间，我和吕秀，以及依色，我们合伙煮饭吃。轮流烧火，不烧火的退出来站在门洞前淋雨。那时候身体好得就像一棵树，淋一场雨都能长高一点似的。

五年级上学期，我去依色家串门。为了联络感情，我们就像亲戚一样互相走动。她家住在山顶，那是一个山顶盆地，空气稀薄，景色壮美。住在那里的人一律披着毡子，戴着毡帽，如果在地里劳作时不起身，他们就像一群羊。

那年，在江油九〇三医院，主治医师将我和坐火车从部队赶回来的兄弟带到僻静处，跟我们谈起父亲回天乏术的病情，要我们自行决定父亲的去留：是继续治疗，还是放弃治疗。我很少跟外人谈起这件事，即使在我、母亲和弟弟三人之间，我们也避而不谈。其实，父亲的死，是我和弟弟共同“拿的主意”。在家里，父亲就是顶梁柱。大事临头，生死攸关，大多生怕我们伸手借钱的亲友躲都躲不赢——当然，我们没权利要求别人，别人也没有这个义务帮你。叫天天不应，唤地地不灵，我们怎么办？当然，也有一些亲朋向我们伸出了善意的援手，但也仅仅是杯水车薪。父亲住院的那段日子，我几乎看尽人间冷暖。

那时候，摆在我 and 兄弟面前唯一的退路，就是把昏迷的父亲送回家中，让他活着回到故乡，死在故乡。临走之际，在医院里抢救多日后被救护车送回家中，依然深度昏迷的父亲面色平静，眼角却是湿润的。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流泪，那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那令我撕心裂肺、痛苦万分的场景至今难忘。氧气袋里的氧气快没了，父亲就要走了……家人和好友亲朋在堂屋跟父亲说着别离的话，送他最后一程。我因为不愿也不敢面对这残忍的生离死别，浑身颤抖着钻进卧室，不要命似的，一根接着一根抽烟。生命如此脆弱，人生如此虚幻。

时过境迁，对父亲而言，人间许多事如今早已变成了后事，许多的话也变成了后话。时隔数年，我已年满三十，在人生的半山腰上回忆父亲最后的时光，依然难过不已。我也时常在想，要是父亲从未离开，今天的日子会是怎样？要是父亲还在，他现在就是几个孩子的爷爷了。兄弟和我已经先后成家，部队退役的兄弟已有两个女儿。今年二月七日，我也幸运地成为父亲，妻子为我们生了一个男孩。望着儿子黝黑而又鲜嫩的面孔，不得不相信，我少年时晒过的阳光，也遗传到了他的皮肤上。我给儿子起了一个粗粝的小名：石头。

成为父亲这段日子，我经常想起父亲，想起断裂带的秋天。

秋天，皮肤泛黄的秋天，懒洋洋蜷缩在大山腹地的断裂带正芳华渐逝。茂盛的草木开始大面积、大张旗鼓地撤退，在秋风金黄的叫喊声中，在时间的褶皱里，在父亲比星星还亮的咳嗽里，它们一天枯黄、衰老。卷土重来的希望，被溃烂后的枝叶保留在沉默而又魔力无穷的泥土之中。

断裂带的秋天是寂寥的。大地苍茫空阔，世界好像整个地膨胀了好几倍，让人心生出淡淡的寂寥和惆怅。幽邃迷人的天空愈加高远。家门前的平通河，则瘦成一根细绳，有气无力地缓缓流向下游。墨绿的青苔像水草的头发，在水底飘荡，沉寂的沙石清晰可辨。不时有鱼儿跃出光滑如镜的水面，好像河再也瘦不动了，倘若再瘦下去的话，它们便只能另谋生路，长出柔软轻盈的翅膀，飞到天上。

秋天的早晨，携带着某种神性光环和神秘气息的雾霭，如仙女下凡一般翻过夜晚后，渐渐清晰。臃肿而又轻盈的身躯，围中似的环绕着断裂带的绵延高山，犹如父辈们被汗水、沉默和劳累浸润的命运，牢牢拴着这片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土地。作为回应，或者说报答，土地也不吝吝啬，总是力所能及地为断裂带世世代代的耕耘者提供粮食、水果、蔬菜和灶膛里熊熊燃烧、噼啪作响的柴火。土

## 日薄西山

◎羌人六

父亲离去的时间是地震后的第三个秋天。二〇一〇年。那会儿，家里刚修好一栋看上去还算气派的楼房，淤积在家庭眉宇间多年的贫困也刚开始冰雪消融。因为生意失败和早年迷恋赌博，一度窘困落魄的父亲最大的心愿就是体面地活着，看着我和兄弟两人成家立业。然而，正值家境和事业峰回路转之际，父亲却永远地走了，一声不吭地走了。对于父亲，我们有着太多的愧疚和无奈。

地，断裂带人的衣食父母。“衣食父母”，这个美丽而又朴素的词汇，似乎不仅仅意味着血脉的延续，更意味着耕耘者与土地的关系：唇亡齿寒，生死相依。

散发着幽香的泥土是一种混融，记忆和想象水乳交融的“结果”。不仅仅是因为断裂带，因为故乡黯淡而又寂寥的秋天，因为在秋天里离去的父亲，当“日薄西山”这个词像飞鸟在我潜意识的天空翱翔，我相信自己已然领悟到了某种来自大地、自然和生命的奥秘：苍茫，辽阔，深邃，超然物外。

### 叁

那个苦闷而又惶惑的春天，郁郁寡欢的春天，希望和理想在尊严的皮肤下面、残酷的现实面前日益黯淡的春天，梅花刚在断裂带的枝丫上冒出花骨朵的春天，想起来眼睛总会泛酸的春天，我毅然辞掉北川的工作，灰溜溜地离开了新北川县城。带着近百本文学书籍，一床大学时代睡了四年、已经严重缩水的铺盖卷，我同刚刚开始交往的小我五岁的女友，一起来到绵阳，在一个名叫三里村的居民小区落脚，准备重新开始。说是开始，无非是打算找点事情，挣钱养活自己。这个质朴而又务实的想法，源于母亲的奚落和失望，其次是一些亲朋的冷嘲热讽。他们对我的“不务正业”有着某种毫不掩饰的愤怒，总是如唾沫星子般在我面前袒露无遗，让我无地自容。

他们说：“大学生，你得想办法工作。”他们说：“没有工作你什么都不是。”他们说：“你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？”

没有工作就意味着一事无成。他们是对的。但我不想工作并非倔强、偏执，而是因为，我自己也很迷茫，自己能做什么。空气中没有一只手朝着我伸过来。焦虑的母亲似乎并没有意识到，她也成了人群的一部分。而人群，仅仅是一种幻觉。父亲的死亡似乎只是无情宣告了我们的孤立无援，或者说，日薄西山的开始。因为，没有人。没有人。

如赫塔·米勒所言：“我所拥有的我都带着。”

在北川新县城工作一年左右，尚有近万元工资没有结清。工资没有结清不碍事。“挂在树上的果子早晚都要熟”，那时候，我以为拿到工资是早晚的事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家公司早已日薄西山，人去楼空了，即使等到猴年马月，看见工资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了。但那时候我却一直相信善良的老板会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将我的“心血”打到我的银行卡上。辞了工作，但说话做事仍有底气，毕竟，在这颗古老的星球上，本人还有一笔额度不小的欠款。现在想想，那时候天真无邪的我，就像那笔拖欠工资膨胀出来的幻觉。

在绵阳，落脚于三里村露德圣母堂背后一栋简陋而又热闹的廉租房里。可能是因为“露德圣母堂”用四川话说着拗口，当地人便把它改称为“天主教堂”。租了一间一室一厅带厨房和卫生间的小房子，每月租金三百元，还减了十元。女房东每次上门收房租的时候我都心惊胆战，心想，要是她再少四十块钱，就糟了！楼下搓麻将的声音终日不绝于耳，素来厌憎赌博的我一度产生幻觉，以为自己快要听懂了。